

雷震：一位捨棄榮華的前「外省權貴」

在1940年代的中國，他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，也是一位受到蔣介石充分信賴的政治精英。可是他卻在1949年來台之後，由於堅持民主理念，反而淪為國民黨軍事監獄的囚徒。這就是雷震先生的故事，也是台灣民主運動裡一頁悲壯的歷史。



雷震先生，1897年生於中國浙江省長興縣。少年時赴日本留學，入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，1923年畢業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的法政學科，主修憲法。1926年回到中國，曾任湖州中學校長，再轉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，1932年擔任南京國民黨黨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，1934年7月起擔任教育部總務司司長。[1]

二次大戰期間，雷震先生獲得蔣介石的信任和提拔，擔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。1946年1月出任制憲國大代表兼副秘書長。1947年當選國民大會代表，同年4月出任張群組閣之行政院，擔任政務委員。1949年起並兼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以及中國國民黨設計委員會委員等黨政要職。[1]

1949年10月，雷震先生來到台灣，與當時擔任教育部部長的杭立武討論籌辦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的事宜。講述雷震先生的生平，就不能不提到他創辦的《自由中國》雜誌。《自由中國》最初的構想原來是在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之前就產生了。當時有一部分國民黨內的自由主義分子，他們認為要堅定反共信念，就必須要有一份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雜誌。儘管當時共產黨已經席捲了長江以北的半壁江山，然而隔著長江天險，這批自由派人士認為，只要中共不渡江南下，而國民黨能夠在政治上加以改革，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，那麼仍然擁有江南地區的國民政府就還有放手一搏的機會。因此胡適、雷震、杭立

武、張佛泉等人，研議創辦《自由中國》[1, 2]。可是雜誌未及創辦，共產黨即以金條收買了國民黨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，掉轉要塞巨砲反轟國民黨江防艦隊。共軍於是在1949年4月21日以木船輕易渡江，國民黨在中國全面潰敗。接著，美國發表「對華白皮書」，終止對蔣介石的軍援，國民黨也結束了在中國的歷史，撤退來台。[3]

雷震先生來台以後，向杭立武重提創刊《自由中國》。當時的國民黨政府，為了重新獲得美國的軍援，不得不重用黨內的自由派人士，來改善它一向被視為法西斯政府的不良形象。於是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答允資助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的創立，還由教育部撥出一間房子讓他們使用。1949年11月20日，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終於在台北創刊。由長期居住美國的胡適先生掛名為發行人，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先生和台大哲學系的教授殷海光，而雷震先生也是雜誌社實際上的負責人。創辦之初，《自由中國》傾向「擁蔣反共」的立場，與蔣介石關係良好。雷震先生也在1950年受聘為國策顧問，並於1950及1951年兩度代表蔣介石赴香港宣慰反共人士，是置身於國民黨權力核心的人物之一。[1, 2]

1950年韓戰爆發，為了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，美國政府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，接著與國民黨政府訂定「台美共同防禦協定」。國民黨政府因為重新得到美國的支持，國際關係再度好轉，於是就不再需要利用《自由中國》來為它粉飾民主開明的假象，因此對這本雜誌的支持就大不如前。再加上國民黨內，強人體制逐漸鞏固。黨內的自由派人士由於不滿蔣介石的威權統治，紛紛離開權力核心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《自由中國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，從批判共產主義轉而檢討台灣內部的問題，而且經常批評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弊病。[2]

1954年12月,《自由中國》發表了余燕人、黃松風、廣長白等三人的投書〈搶救教育危機〉,對蔣氏父子的「反共救國團」介入校園行政,企圖以黨國教育來影響青少年心智發育的行為,進行了強烈的批評。文章發表以後,蔣介石勃然大怒。同年12月,蔣介石在國民黨的「宣傳彙報會」上下令開除雷震先生的黨籍。中央黨部秘書長唐縱表示,雷震先生到台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。蔣介石聽了依然憤憤的說:「沒有黨籍,也要開除!」。[2, 4]



為了聲援雷震先生,殷海光旋即在《自由中國》上發表了〈我們的教育〉和〈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〉兩篇文章,強烈呼籲官方停止“黨化教育”,並且要求學術自由,簡化課程,為國家保留一片生機。從此以後,《自由中國》的言論逐漸轉變為“民主反共”,並且重視人權自由,與蔣介石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權開始漸行漸遠。[2]

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70歲生日。一向浸淫於中國官場逢迎文化的蔣介石,這一次卻別出心裁搞了一個“婉拒祝壽貢獻建議”的花招。蔣介石的“婉辭”,要求各界人士不必替他祝壽,以免勞民傷財。但是希望大家能夠從六個方向來為他提供建議。蔣介石提出的前五個方向,不外乎是希望大家建議如何建設台灣成為“三民主義模範省”;如何營造蓬勃活潑的“民族復興基地”;以及如何貫徹“反共復國”的使命等等陳腔濫調。但是蔣介石提出的第六個方向卻是令人耳目一新。蔣介石在“婉辭”的第6項說:「盼對中正個人平日言行與生活,以及個性等各種缺點,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。」[5]

10月17日下午,台灣民社黨常委蔣勻田到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,建議《自由中國》應該出一期“祝壽專號”。第二天,《自由中國》特別召開會議研究,會中決定,應該抓住這一個機會,率直對國事表示意見。《自由中國》的這一群書生認為,以往對蔣介石說真話有危險,然而這一次是蔣介石自己叫人提建議,而且還要求對他本人的“個性等各種缺點,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”,這樣的進言機會實在太難得,千

萬不能錯過了。於是決定當天在場的人每人撰寫一稿,而且各述重點,盡量不要雷同。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,也應邀趕寫了一篇〈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〉。胡適講艾森豪的故事,旨在告訴蔣介石,作為台灣的最高領導人,應該要將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考慮大事方面,不要對下面管得太死,太多,太細。況且一個人的智慧畢竟有限,一些自己不懂,不會幹的事情,就要讓那些有智慧,懂行,會幹的人去做。[5]

1956年10月31日,替蔣介石祝壽的《自由中國》第15卷第9期提前上市了。在社論〈壽總統蔣公〉一文中,一共談了三個蔣介石難以接受的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提到,根據1946年制定的憲法第47條的規定,總統和副總統的任期為6年,可以連選連任一次。蔣介石的第二任任期還有3年,任期滿了怎麼辦?社論希望蔣介石能夠像美國的國父喬治華盛頓那樣,只任兩期就不要再任了。[5]

這一期的“祝壽專號”還在封面上用紅色套印了“恭祝總統七秩華誕”,再加上胡適等人的文章切中時弊,火力強大。31日雜誌上市後,很快便銷售一空,以後又增印11次之多,印數達到數萬冊,雜誌社每天都收到大批的讀者來信。[5]

在台灣,人人皆知蔣介石的“婉拒祝壽貢獻建議”,只不過是一種沽名釣譽的封建帝王心態。於是10月31日當天,台灣各機關,團體都照常舉行了祝壽活動,門口張燈結彩,鞭炮齊鳴。反共救國團也在總統府門前舉行大型的祝壽活動。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更是逢迎不落人後,在蔣介石生日的前兩天,就由中央黨部通知全體中央委員務必在31日當天到中央黨部設立的壽堂簽名祝壽。中央黨部在“壽冊”上還書寫了一篇極近阿諛能事的“壽序”,而且要求祝壽的中央委員要默讀“壽序”再簽名祝壽。“壽序”約200字,全文如下:

「天生聖哲,應五百年名世之徵;民有依歸,慰億兆人來蘇之望。維我總裁,聰明睿智,領袖群倫,作革命之樞機,為黨國之柱石。聲名洋溢於世界,事功彪炳於人寰。當去邪之際,亂憐維殷,廣興夏之謀,自強不息,生聚教訓,宵旰矢勤,掃蕩澄清,瞬息

可睹。光華明亮，呈元首之麟祥；叱吒風雲，待大人之虎變。歡呼頌稀齡之壽，壽並河山；簽壽表同德之心，心堅金石。」，下書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敬獻」。[5]

1956年10月出版的《自由中國》15卷第9期，推出「祝壽專號」，其社論〈壽總統蔣公〉，因涉及敏感問題，引發當局的高度關切！



據國民黨《中央日報》報導，31日當天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祝壽的國民黨高官達千餘人，各各都在“壽序”後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，領銜的是陳誠，張群，俞鴻鈞，……………。[5]

蔣介石，蔣經國父子看了《自由中國》“祝壽專號”後十分憤怒，便開始謀劃反擊的活動。他們採取的主要措施有三：第一是在國民黨控制的報刊上，連篇累續地發表圍剿“祝壽專號”的文章；第二是組織專人編寫在國民黨內部以及在軍中進行批判“祝壽專號”的宣傳材料；第三則是指使特務恐嚇承印《自由中國》的印刷廠，使《自由中國》的印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。[5]

全面圍剿《自由中國》的行動於焉展開，首先發難的就是蔣經國主持的“反共救國團”的《幼獅》月刊。該刊以〈揭穿共匪戰術，防止思想走私〉為題發表社論，攻擊“祝壽專號”上的文章，不是給蔣總統祝壽，而是共產黨思想在台灣走私，呼籲台灣各界人士都要嚴加防範。[5]

接下來，國防部總政治部辦的《國魂月刊》也發表了〈消除毒素思想〉和〈事實俱在，不容詭辯〉的兩篇社論，指控《自由中國》“祝壽專號”的三大罪行：第一，為共產黨的思想走私；第二，爭取自由，民

主就是破壞團結反共；第三，追求言論自由就是不愛國，不革命，不反共[5]。這種以“國家利益”凌駕於“個人自由”之上的“法西斯式的民主”，國民黨徒戮力奉行，一直到今日。

隔年1957年2月8日，國民黨黨報《中央日報》刊登了一條宣揚“我國報紙雜誌均有言論自由”的評論，又在2月11日報導了一則“總統主持國父紀念會，闡釋民主自由真諦”的新聞。文中報導蔣介石在會中落落大方的說道：「遵憲法軌道發揚民主，循法律範圍維護自由，為國民革命一貫奮鬥之目標」[5]。這就是至今仍為國民黨徒奉為佳臬的說謊文化。

在“祝壽專號”之後，由於特務人員連續造訪印刷廠抽檢，《自由中國》前前後後換了7家印刷廠。教育部也削減了原來每個月300元美金的撥款，雷震先生不得不設法四處籌錢，甚至變賣房產，每日擠坐公共汽車。妻子宋英日後曾自嘲說：「自從辦《自由中國》以來，我們的房子越住越小，車子卻越坐越大哩」。[6]

在排山倒海的圍剿浪潮中，《自由中國》仍然堅持以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，繼續在國民黨戒嚴體制內尋求突破。從1957年7月起，《自由中國》更以「今日問題」為總標題，連續發表了十五篇社論，其中一篇由殷海光執筆的〈反攻大陸問題〉，陳述短期內反攻大陸不可能成功的原因。因此，殷海光建議政府，不要把該做的事以「等反攻大陸以後再說」來推拖。這一篇社論，毫不留情的揭開了國民黨“假借反攻大陸之名，遂行獨裁統治之實”的真面目。該文後來被國民黨媒體指控為「散佈反攻無望論」，成為日後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之一。[2]

1960年，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。5月4日他發表了〈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〉，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的國民黨。5月18日，台灣的非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，主張成立新黨，要求公正選舉，實現真正的民主。大家決議即日起組織「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」，隨即籌備組織「中國民主黨」。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，與臺灣人李萬居、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，在7至8月間一共舉行了四次分區座談會。這一次自由派外省菁英與本土勢力首度破天荒的大結合，不但踩痛了國

民黨高層最敏感的一條神經，同時也引起了許多在台灣的外省人的戒心。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外省人普遍認為「把台灣人搞起來，外省人就要受其欺壓的。」[3, 6]

同年9月1日，《自由中國》第23卷第5期發表了由殷海光執筆的社論〈大江東流擋不住〉，表示組織政黨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東流，是任何獨裁政府所抵擋不住的。三天之後的9月4日，雷震先生以「知匪不報」和「為匪宣傳」的罪名，與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的同仁劉子英、馬之驩、傅正三人一齊被捕。

在偵訊尚未展開，軍事檢察官也還沒有起訴之前，國民黨負責文宣部門的「七二〇一」小組便由中常委陶希聖、中四組主任曹聖芬以及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沈錡出面，宴請各報社負責人。當場散發《「自由中國」半月刊違法言論摘要》的白色封面小冊，企圖透過大眾媒介影響社會對雷震「產生厭惡心理」，來合理化、合法化逮捕雷震的行動。[6]

十月八日上午，蔣介石在總統府召集副總統陳誠、張群、唐縱、谷鳳翔、司法院長謝冠生、外交部長沈昌煥、司法行政部長鄭彥棻、新聞局長沈錡、檢察長趙琮、陶希聖、曹聖芬、汪道淵、黃杰及周正等十四人。聽取相關報告後，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之刑期不得少於10年，並撤銷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的登記證。在最高領袖「辦案猶如作戰」的耳提面命之下，情治單位先是脅迫劉子英自認匪謀，再由軍事法庭以「包庇匪謀、煽動叛亂」的罪名判處雷震先生十年徒刑，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從此走入歷史。[6]

雷震先生入獄後，1961年64歲生日，在美國的胡適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《桂源鋪》饋贈。詩云：「萬山不許一溪奔，攔得溪聲日夜喧。到得前頭山腳盡，堂堂溪水出前村。」可惜胡適先生本性懦弱，後來為了怕得罪蔣介石，非但對雷震事件絕口不提，也不再探監了。[1]

1970年9月4日，雷震先生刑滿出獄。1971年12月撰寫〈救亡圖存獻議〉，提出十點改革建議。一：建議更改國名為「中華台灣民主國」。二：請蔣總統任滿引退。三：國民黨要放棄事實上的一黨專政。四：減少軍費支出，健全軍事制度。五：徹底實行法治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。六：治安機關應徹底

改變作風，並嚴加整飭工作人員，以免擾民、誤民、害民。七：解除報禁。八：簡化機構。九：廢除省，或省級虛級化。十：大赦政治犯。1972年1月10日呈送〈救亡圖存獻議〉至總統府及行政院，始終未獲回應。1979年3月7日，歷經磨難的雷震先生，以82歲高齡辭世。[1, 3]

曾有某國民黨高層批評雷震不過是一個失意的官僚政客。與雷震先生相交十多年的老友殷海光，反唇相譏道：「雷震先生20歲就加入了國民黨，官運亨通，他不難和目前若干聰明的知識分子一樣，錦衣玉食，汽車出進，洋洋自得……卻堅持民主憲政的主張，結果被開除黨籍，終至身陷囹圄。前一條坦途易暢達，後一條險惡不堪，他偏偏選擇了後一條。他豈止是一個官僚政客，簡直是一個最愚蠢的官僚政客！」[7]

獄中，雷震先生曾自寫春聯：「十年歲月等閒度，一生事業盡銷磨」，橫聯是「所幸健存」。1979年辭世時，那位與他糾葛一生的蔣介石也已經離世4年。查閱蔣介石去世當天的雷震日記，只有短短數言：「今日報頭均不准用紅字，電視停止娛樂。完全是一些挽祭的節目，據稱將停止娛樂一個月，這實在太長了。」[7]

【後記】

雷震案中四位外省籍的重要關係人，後記如下：

殷海光，國立台灣大學教授，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大師。1919年12月5日出生於中國湖北省黃岡縣。十六歲便於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。1938年入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，1942年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，1946年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，1949年赴台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講師。殷海光一面在台大任教，另一方面為《自由中國》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，其中以社論《大江東流擋不住》最為有名。但是在雷震入獄和自由中國被查禁以後，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。1960年遭《中國季刊》圍剿，被指控為「偽自由主義者」「文字賣國者」以及「知識詐欺者」。1964年，長期領有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被停止，出版的著作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也被查禁。1966年7月台大無故不再續聘殷海光。1967年應哈佛大學邀請訪美研究中國近代思想，因為申請出境遭拒，無法成行。接著，著名的德國哲學家海耶克教授來台訪問，也被禁止與殷海光

晤談。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雙重折磨，1967年罹患胃癌，兩年後病逝，享年五十一歲。[8]

傅正，1927年12月11日出生於中國江蘇省高淳縣。1940年加入中國國民黨，1945年加入青年軍，1950年來台。1954年起參與《自由中國》的編輯工作，也是作者群之一。1955年插班台大政治系，1957年畢業。1960年因為與雷震先生參與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，一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。首先判處交付感化三年，後因拒絕感化，又延長三年刑期，一直到1966年才獲釋出獄。1968年到世新專科任教，1971年獲聘任教於東吳大學政治系。1979年參與創辦美麗島雜誌社，並擔任編輯。1986年，與另一位捨棄榮華的前「外省權貴」費希平先生一同參與民主進步黨的創黨工作。1989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立法委員落選。1991年因胃癌病逝，享年六十四歲。[9]

劉子英，雷震案時擔任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會計，與雷震先生一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。在情治單位的威逼利誘之下，自白是中共派到台灣的匪諜，而且早就向雷震說明，這讓國民黨很快就以「包

庇匪諜」的罪名將雷震構陷入獄。劉子英以匪諜罪被判十二年，但在獄中卻備受禮遇，據說當局應允給他的回報是「養其終生」。1989年離開台灣，臨行前，他給雷夫人宋英女士留下了懺悔信一封。信中說：「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，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，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，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，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傲公〈編者按：雷震先生，字傲寰，所以稱傲公〉，這是我忘恩負義失德之行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，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。」兩年後劉子英在重慶黯然離世。[10]

馬之驢，雷震案發生時，不過是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裏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經理，與雷震同時被捕入獄。在獄中原是情治單位威逼策反的第一個對象，因為他堅持不從，情治單位才改從劉子英下手。後人有云：「有了馬之驢，才顯出劉子英的不堪。」馬之驢最後被判感化三年。出獄後依然留在出版界，後來出任臺灣東華書局總編輯，著有《中國的婚俗》、《新聞界三老兵》、《雷震與蔣介石》等書，今仍健在。[11]

參考文獻：

1. “雷震”，維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書
2. “自由中國”，維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書
3. 李筱峰，“雷震與台灣民主運動”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，http://www.twcenter.org.tw/a01/a01_03.htm
4. 薛化元，“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----1950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”，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1996
5. 汪幸福，“胡適給蔣介石祝壽惹風波”，文史精華月刊 (Gems of Culture and History)，2004年，第12期，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
6. 林淇瀟，“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：雷震回憶錄《新黨運動黑皮書》導論》，《TaiwanNews總合周刊》99期，2003/09/18，頁84-91；100期，2003/09/25，頁72-78
7. 林天宏，“雷震：倔強的筍心”，中國青年報記者專題報導，2007年5月9日，中國青年報
8. “殷海光”，維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書
9. “傅正”，維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書
10. 范泓，“雷震案：政治構陷的悲情”，社會科學論壇 (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)，2004年，第07期，河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
11. 范泓，“胡適為馬之驢證婚”，書屋月刊，2004年第6期，湖南教育出版社